

中美博弈下“十四五”如何践行“双循环”：兴农村、扩权益、育人才、待创新

宏观研究报告

宏观分析师：袁野

电话：15810801367

Email: yuanye@tpyzq.com

执业资格证书编码：S1250117080032

核心观点：

中美博弈下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再次引发市场波动。原以为在特朗普的百般“磨练”下，我们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看来对拜登寄予的希望还是有点高了。实际上，从政府工作报告对2021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定调，已经表明政府对于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当然除了心里准备，还有具体的应对。我们认为“十四五”规划的完成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果只是零星的去看待每一点，不免盲人摸象，对每一项改革的认识亦是可大可小。中国提出“双循环”实质上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十四五”规划则是对“双循环”不折不扣的践行。

“双循环”并非是外部环境恶化的被动应对，它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箱体中扩张的气球，箱体是科技给予的边界，或者说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边界，也是康波的最长周期。而气球的膨胀与收缩则是在现有科技水平下经济的增长与衰退。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气球从各个方向向箱体边界无限接近与扩张的同时，努力推进箱体体积的扩大。对于我们来说，箱体的扩大应该对应“创新是根本动力”，而“双循环”则是气球无限向箱体边界接近的有效手段。

“内循环”的本质是共富。贫富差距过大可能逐步发展成三个阶段的问题。第一个阶段是高收入者收入增长，而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低收入者收入无增，甚至减少，而边际消费倾向高涨，这种情况尤其是危机过后货币宽松的政策下尤为突出。这一方面并不利于消费增长，甚至可能形成反噬，进而拖累经济扩张。另一方面可能激发民粹主义，甚至引发冲突。当贫富极端分化，经济又进入瓶颈时，就可能发展到第二阶段，即民粹主义。民粹对于政治家来说是绑架，为了应对民粹，政治家有矛盾外移的诉求，这就有可能发展到第三阶段，极端民族主义。因此，共富的理念发展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扩大进口稳住“外循环”。对于域外的管理，一个普遍的道理，要么制约生产，要么制约需求。在全球军事实力逐步均衡的前提下，面包往往比枪炮更有效。

盘活土地要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提升股权融资是供给与需求联动的关键。首先，农地流转有助于扩张低收入群体——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新兴产业扩张创造更多的高收入岗位，二者将显著提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释放内需的潜力。其次，新兴产业扩张同时带动企业投资降低对政府刺激的依赖，消除消费到投资的传导漏损，同时亦

美国菲律宾普斯曲线平坦化

帮助政府完成由“主导经济”向“服务经济”、刺激投资向刺激需求的转化。第三，金融是实体的润滑剂，依靠权益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有助于降低债务风险，平衡各类型实体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通过国内外不同融资渠道规模占比的比较，我们认为只有在权益市场规模与企业间接融资规模基本相当，甚至有所超越之时，对于权益市场的支持才能真正的等同于支持实体经济，并具备所谓“长牛”的基础。

2018 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时，我们曾写过一篇报告《40 年的改革开放，40 年的思潮激扬——效率与公平的再出发》，报告中详细回顾了 40 年改革开放我们经历的种种“磨难”，然后一次次从“磨难”中浴火重生。当时写报告的初衷就是要增强信心，因为成长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以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最困难的时刻，只是因为过去种种我们并没有经历，将来种种我们还在依据目前的认知判断。就像如果我们站在 2001 年“入世”之际，可能并不会预期外需会有波澜壮阔的扩张，恐怕更多的是对“引狼入室”的担忧。

不管是自信也好，担忧也罢，一轮新的改革已在路上，理解、认知、参与再到驾驭，这才是跟随“国运”该有的姿势。

风险提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超预期退出。信用风险向政府隐性债务扩散。

目录

一、“双循环”是对经济发展瓶颈的突破，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恶化的外部环境 3

（一）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不能走极端，向“17+1 合作”寻求突破 3

（二）“双循环”是“箱体气球”最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5

（三）“内循环”的本质是共富，理念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6

（四）扩大进口稳住“外循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7

二、总供给的要素市场改革 9

（一）劳动力要素改革重点在适应时代的人才培养与引进 10

（二）权益市场的扩容时期将以稳为主 11

（三）农地流转盘活土地要素 13

（四）基础研究+绿色+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新兴产业，从短期到长期的创新 14

三、需求侧的变革——富农、兴新、减负 17

（一）劳动者报酬向消费的转化 17

（二）营业盈余向投资的转化——企业投资由基建带动向产业扩张带动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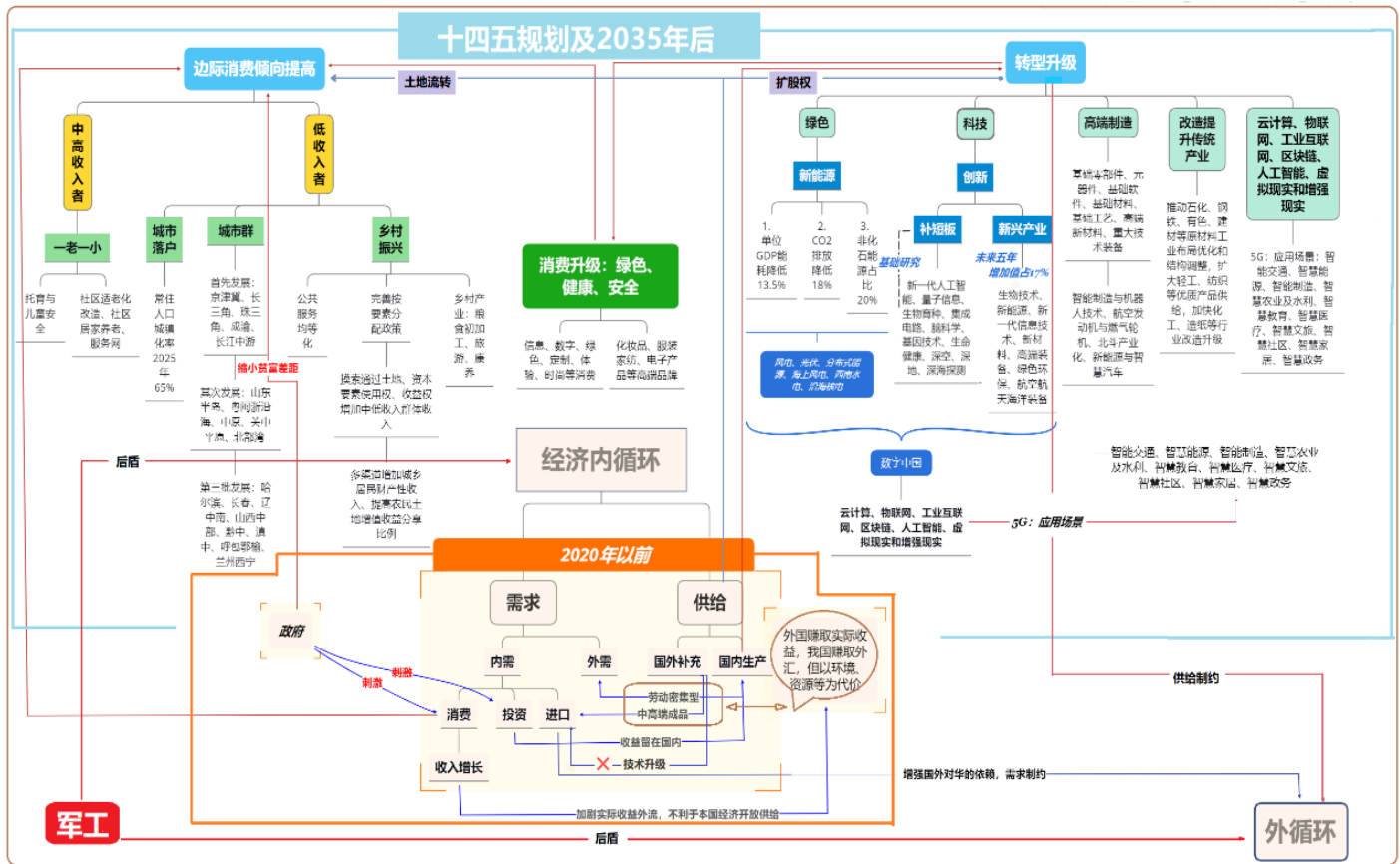
（三）完善税制，扩大税源替代隐性发债收入向政府有效投资的转变 23

图表目录:

图 1: “十四五”规划纲要及二〇三五远景规划系统图 1

图 2: “箱体气球”示意图 7

图 1: “十四五”规划纲要及二〇三五远景规划系统图



中美新一轮谈判还是在争论声中开始了。“得益于”特朗普政府对我们的百般“磨练”，对于此次谈判，从今年经济增速的目标看，相信我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唯一比较超预期的可能就是“美国连最基本的外交礼仪都不顾”了。美方提高嗓门威慑这一招，应该已经不新鲜了。“有理不在声高”，大到两个国家，小到路边打架，往往叫骂最凶的，反而是底气不足的表现。我们不盲目乐观，也不妄自菲薄，只是想想，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博弈中，我们能怎么突破。再结合“十四五”的规划，验证我们的想法，并从中寻找投资的线索。

一、“双循环”是对经济发展瓶颈的突破，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恶化的外部环境

(一) 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不能走极端，向“17+1 合作”寻求突破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内需扩张困难。2001年12月11日，我们重返世贸组织，依靠外需扩张的路径，让中国的经济迎来了一波近十年的快速增长。2018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外部环境开始显著恶化。因此，提到“双循环”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这是在美国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

我们实质上并没有准备彻底改变对“改革”的认知，而是或多或少寄希望于拜登，希望他主政后按套路出牌，再回到奥巴马时期甚至是更早的中美“蜜月期”。可能么？我们在去年写报告预期美国大选时，曾毫不犹豫的给出特朗普即将胜选的判断，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理性思考了，更是一种强烈的退而求其次的期盼。因为不管拜登此人对华态度如何，都无法改变美国政府对华的战略转变。换句话说，美国如果能按照某一个总统的想法而改变治国理念，那美国就不是美国了。而对于我们来说，拜登对于特朗普更差的地方就在于他要重新“团结”所谓的“盟友”。因此，拜登入住白宫还不足百日，昔日“盟友”就纷纷开始了态度的转变。日本与美国重新“狼狈为奸”，钓鱼岛已经几年不提的问题，又重回热点。欧盟成员国大使 17 日协商同意，就所谓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实施制裁，这将是近 30 年以来，欧盟首次对中国实施制裁。这就是美国民主党的所谓“价值观”，这就是拜登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麻烦”。

对于拜登上台以来中美之间的首次交锋，市场的表现应该还算相对正常。而对于欧洲挑起的所谓制裁，市场可能开始不淡定了。这件事我们认为需要从三方面辩证的看，首先，如果美国决意与中国正面强力交锋，那么此次所谓的“人权制裁”不应该由欧洲挑起，然后英美澳跟风。这一方面是美国在“炫耀”自己的同盟关系，进而给对手施压。另一方面美国不首先挑起争端，也是给自己留有余地。因为如果美国首起争端，一旦无法全胜，就可能引发其“盟友”对“领导者”能力的质疑。不恰当的比喻，类似于美国对叙利亚与利比亚武力介入，不把自己直接陷入泥潭，还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其次，制造所谓“人权制裁”，更多的是对一国内政的无端指责与干涉，但从对经济的影响看，应该远不及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更为直接。在全球疫情逐步恢复，前路依然坎坷之际，直接与中国这个需求大国挑起经济争端，与谁都不利，除非这个国家或地区完全由民粹上升的狭义民族主义所控制。第三，拜登目前的重心仍在国内，如果拜登此刻就决定祸水东引，应该只是希望拖住中国向前的脚步。除非美国国内疫情真实情况已不可控，才可能使用转移国内视线的惯用伎俩。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市场对欧洲挑起的所谓制裁反应过度了，超调了。唯一可以认同的解释就是对拜登预期太好了，预期发生偏差了。但是实在有必要分清楚争端是“确实影响”还是“表面叫板”。

从长远看，中美之间，已经不是哪个总统能改变了的，它是世界第一对地位不保的过度担忧，是对既有状态发生改变时的恐惧。所以，美国不停的在指责中国，现在不是都挺好么，为什么要逐步改变它。而对于中国，闷声发大财可能么？最简单的，GDP 数据是摆在世人面前的，沿海城市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军事装备是肉眼都可见的，藏得住么。所以不要再寄希望与哪一个总统，不要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实如此，坚定发

声也是一种策略，震慑其“盟友”，促其重回中立。同时也要建立一个对外合作的榜样做“诱饵”，重心可以向中国——中东欧“17+1 合作”转移，比如此次同样作为欧盟成员国的匈牙利，其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成员国外长会议上就提到“欧盟新的制裁是极其有害的，这将进一步危害欧中合作。如果能将合作根植于理性的土壤，那欧盟将会受益匪浅”。世界大势，分分合合，不要因为中欧签订投资协定就拍手叫好，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心本无生因境有，应作如是观。再回到“双循环”，对我们这个外向型国家，受到如此大的外部压力，提出“双循环”，不能不说有外部环境改变的考虑，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

（二）“双循环”是“箱体气球”最优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循环，借用系统论的观点，即一个系统其所能发挥的功能和赖以存在的条件相匹配。如果二者完全匹配，那么就是一个标准的“内循环”，如果二者完全不匹配，那么就是一个“外循环”。但是，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无论是哪个经济体，完全的内循环是不存在的，一个系统总是要同外界交换能量和信息。并且，纯粹的外循环也是不存在的，完全依赖于外界条件来维持自己系统的正常功能，是十分脆弱的。一个系统的常态是内外循环并存，以强健的内循环作为支撑，以活跃的外循环作为配合。

“双循环”应该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的必由之路。对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我认为可以看作是在一个箱体中扩张的气球，箱体是科技给予的边界，或者说是单位劳动生产率的边界，也是康波的最长周期。而气球的膨胀与收缩则是在现有科技水平下经济的增长与衰退。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气球从各个方向向箱体边界无限接近与扩张的同时，努力推进箱体体积的扩大。

箱体的扩大应该对应“创新是根本动力”，而“双循环”则是气球无限向箱体边界接近的有效手段。能不能单独依靠外需？其实最初的“循环”战略就由外循环而来。改革开放之初，刺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内部改革释放出的压抑已久的城乡需求，彼时中国与国际的联系并不紧密，出口工业迅速发展，但远未成为主流。到 80 年代中期，我国决策层开始捕捉到大力发展出口这一重要机遇。1985 年，赵紫阳总理在批示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的报告时指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这是“国际大循环”在我国落地生根的重要节点。1987 年，时任国务院十年规划专家小组成员的王建，在光明日报发表《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一文，引起中央重视，代表着当时经济界的声音。文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应走国际大循环的道路，简而言之，就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取得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积累的资金返回来支援农业，

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沿海先行、国际循环，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1992 年中共十四大《公报》就决定要“加速广东、福建、海南、环渤海湾地区开放和开发，力争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伴随着入世，中国的经济在国际贸易的带动下飞速发展，在世纪之交改革大改革的背景下，依靠外循环实现了经济飞跃式发展。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凸显了“单循环模式”不足之处，**过度依靠外循环成为了我国经济的软肋。而长期以来外循环的红火又掩盖了内循环的长期不畅，简单的加以刺激往往遗祸无穷，最终变成长痛。一旦发生危机，就要与需求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言自主可控。**再递进一步，即便假设我们是独领风骚的外向型经济体，在全球经济良性发展阶段当然大家是相安无事。一旦全球经济遭遇危机，如果依然一家独大，势必造成其他外向型经济体的抵制而引发冲突与矛盾。因此单纯依靠外循环不可取。是不是可以完全依靠内需？近代中国作为占全球 GDP 四分之一的国家，在闭关锁国之下的遭遇已经可以证明完全依靠内需同样不行。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要继续深化开放，加深全球合作的原因。

（三）“内循环”的本质是共富，理念的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循环”的根本是共富。效率与公平本就是经济学中的一对矛盾体，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效率与公平应该是轮番发挥作用的。而中美两国可以说都面临效率优先，忽略公平的经济发展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箱体中的气球是椭球体，球的两端可能已经接近箱体的边界，但其他方向空余的部分，却因忽略公平而无法使气球膨胀达到最大化。效率与公平映射到消费上，则对应这收入增长与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的边际效用变化。经济发展初期，效率优先，全社会收入进入快速扩张期，这时收入的快速扩张带来的消费增长，可以忽略贫富差距的拖累。当经济发展在现有科技水平下进入成熟阶段，收入扩张开始放慢，消费增速递减，贫富差距的拖累就会逐步显现，这可能逐步发展成二八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18775

